

区位导向性政策、集聚效应与企业出海 ——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余 振 许德慧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企业出海已成为塑造国家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探索中国情境下企业出海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代表性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切入，在精准识别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边界和内外企业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中国企业出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显著促进了企业出海；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资金、人才和企业集聚效应，能够有效缓解区内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促进企业间信息共享，进而强化企业所有权优势，促进企业出海；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所在行业属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核心高管具备海外经历的企业出海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支持。

关键词：区位导向性政策；企业出海；集聚效应；所有权优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26）01-0031-15

一、引言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当前，面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挑战，落实各项纾困惠企的激励政策，全方位营造助力我国企业出海的良好环境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企业“不出海，就出局”已成为共识。这既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自发选择，也是企业发展遵循的内在逻辑。企业通过出海能够开拓新市场、提升经营绩效并优化学习曲线，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最终助力其跨越式发展（杨忠和张骁，2009；邓新明等，2014；李雪松等，2022）。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后发国家的企业受制于本国资金、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相对稀缺以及自身要素获取和利用能力不足，往往难以获得出海所必需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进而陷入新生者劣势和外来者劣势的双重困境（Dunning，1988；谢洪明等，2019；谢红军和吕雪，2022）。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文简称“国家级经开区”）作为一项被我国广泛采用的区位导向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是以财政激励促发展的典型案例。国家级经开区本质上是在原有城市的政府行政体制之外重新开辟的一个地区，通过在该地区内实施有效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以及产权保护等财政激励政策，吸引企业、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入驻园区，进而形成集聚经济（Wang，2013；郑江淮等，2008；蔡庆丰等，2021），并利用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带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Lu et al.，2019；林毅夫等，2018）。国家级经开区这种基于地方的区位导向性政

作者简介：余振，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开放发展经济学；许德慧，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亚太价值链的重构与合作前景”（项目编号：25JJD79004）。

策在推动我国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区位导向性政策是否能助力我国企业成功出海呢？如果能，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区位导向性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为清晰把握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下我国企业的出海路径、促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为了研究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出海的影响，本文以国家级经开区这一代表性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为研究对象，将集聚经济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相结合，基于所有权优势提升角度，分析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机理。然后，本文手工搜集各国家级经开区的四至范围信息、边界形状图和规划图，精确绘制了国家级经开区的边界图层，并基于企业地址的经纬度信息，运用地理信息技术识别了国家级经开区内外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多期 DID 模型，以企业入驻国家级经开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衡量企业出海，实证检验了国家级经开区对我国企业出海的影响。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体现在以下 3 方面。第一，本文从企业设立海外子公司视角研究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不仅丰富了国家级经开区的微观影响研究，而且为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和经验证据。第二，本文根据国家级经开区的集聚特征，将集聚经济理论和 OLI 理论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从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和信息优势 3 个所有权优势角度拓展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第三，本文综合利用国家级经开区的四至范围信息、边界形状图和规划图等信息，精准识别了国家级经开区的边界，并对企业是否在经开区内进行精准判断，有助于缓解国家级经开区内外企业因未被精准识别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实证研究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基础数据。

二、文献综述

国家级经开区是我国开发区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开发区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与本文最相关的几支文献分别探究了开发区内外企业的识别、开发区的集聚效应以及开发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

一是开发区内企业的识别。目前学界对开发区企业的识别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当企业位于开发区所在城市和区县时，将企业视为开发区企业（Wang, 2013; Alder et al., 2016; 王永进和张国峰, 2016; 孙伟增等, 2018; 卞泽阳等, 2021）。该方法缺陷比较明显，会把设有开发区地区的非开发区企业识别成开发区企业，进而导致计量结果出现偏差。第二，依据企业所处地址的邮政编码信息和开发区的邮政编码信息进行匹配，由此判断企业是否位于开发区内（林毅夫等, 2018）。然而，国内现行的邮政编码体系中，开发区的邮政编码通常和当地区县的邮政编码相同，同时一个开发区也可能涉及多个邮政编码，导致难以精确识别开发区内的企业（蔡庆丰等, 2021）。第三，当企业地址信息中含有“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字样时，将企业视为开发区企业（Lu et al., 2019; 盛丹和张国峰, 2018; 蔡庆丰和陈熠辉, 2020）。该方法通常无法识别企业所处开发区的具体信息。同时，部分企业虽然位于开发区内，但并未在地址信息中具体披露，基于该方法进行识别会遗漏这些开发区企业。第四，解析企业地址和开发区边界的经纬度，通过地理信息技术识别企业是否位于开发区内（Neumark and Kolko, 2010; Zheng et al., 2017; 张丽华等, 2021; 毛捷和柏金春, 2024）。该方法在识别上更加精确，但数据处理工作量较大，且仅能识别披露了具体四至范围的开发区内企业。

二是开发区的集聚效应。现有文献在研究开发区的相关问题时不乏对开发区集聚效应的探讨。郑江淮等（2008）较早将开发区的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归纳为“政策租”和“集聚租”，认为开发

区的“政策租”是形成“集聚租”的重要前提。大量研究也将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归因于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开发区集聚效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Wang，2013；Alder et al.，2016；孙伟增和陈斌开，2023）。但是，上述研究对开发区集聚效应的探讨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相应的量化分析。少数文献在研究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时使用开发区内的企业数量衡量开发区整体的产业集聚水平，并对开发区的集聚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例如，林毅夫等（2018）发现尽管开发区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但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并不明显；谭静和张建华（2019）、蔡庆丰等（2021）则发现开发区通过集聚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投入。

三是开发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出口视角探究了开发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开发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试验，具备明显的外向型特征（陈钊和熊瑞祥，2015）。开发区凭借一系列优惠政策，提高了区内的制度质量，为企业成长营造了适宜的局部环境，被认为是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黄玖立等，2013；杨婵等，2021）。现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开发区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卞泽阳等（2019）通过理论模型证实了开发区的集聚经济有利于降低企业出口固定成本，进而提高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概率；李丽霞等（2020）发现开发区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开发区内的企业更容易进入出口市场；孙伟和戴桂林（2021）则发现开发区通过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上述文献为我们理解开发区的测度和集聚效应以及开发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证据，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现有文献多从企业出口视角探究了开发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鲜有文献从企业设立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开发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开发区企业的识别精细度不够，难以精准识别开发区内外企业，导致研究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降低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试图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

三、理论分析

针对国家级经开区与企业出海的研究，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国家级经开区能否促进企业出海？国家级经开区通过何种机制促进了企业出海？本文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研究企业出海。根据经典的 OLI 理论，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出海的基础，内部化优势是实现所有权优势的途径，区位优势是发挥所有权优势的条件（阎大颖等，2009）。所有权优势通常体现为企业在资金、人力、信息、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对企业出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薛军和程红雨，2024）。同时，国家级经开区的本质是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吸引生产要素和企业入驻，进而形成集聚经济，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林毅夫等，2018）。国家级经开区的集聚经济既包括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集聚，还包括企业这一生产主体的集聚（蔡庆丰等，2021）。本文试图将集聚经济理论和 OLI 理论置于统一分析框架，基于所有权优势提升视角，分析国家级经开区对区内企业出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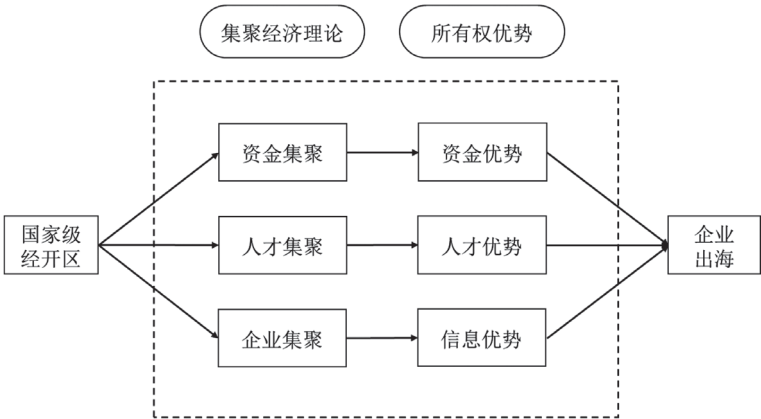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

（一）缓解融资约束机制

国家级经开区通过资金集聚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强化企业资金优势，促进企业出海。企业出海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是否具备资金优势是成功出海的前提（薛军和程红雨，2024）。然而，由于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督成本较高，且缺乏有效的风险对冲手段，出海企业往往难以得到充足的信贷支持，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刘莉亚等，2015）。企业入驻国家级经开区则能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国家级经开区通过积极推进区内投资管理领域改革，以独特的投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部资金流入。一方面，国家级经开区会主动引导外部资金流入经开区。例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指出，要“激发金融主体活力，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持续加大对经开区四大主导产业、高精尖产业和绿色产业发展的投资力度”。^①另一方面，面对国家级经开区内的投资优势，外部资金在逐利性的驱使下也会主动流入国家级经开区。经开区管委会在企业入驻时，会对企业进行评估和审批，保证入驻企业在发展潜力和业务能力等方面都具有较高水平。对资金而言，国家级经开区内企业的投资风险更低，预期收益更高。因此，国家级经开区能吸引外部资金流入，促进区内形成资金集聚。相较于区外企业，区内企业拥有更加充足的资金来源，有助于缓解区内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形成资金优势，助力企业成功出海。

（二）提供人才支持机制

国家级经开区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为区内企业提供人才支持，强化企业人才优势，促进企业出海。除了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对企业能否成功出海同样重要。企业人才越多，生产率越高，越能弥补出海的风险和成本（赵晓阳等，2024）。同时，企业具有海外运营经验或海外背景的人才才能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东道国的文化、规则以及法律法规等，解决出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强化企业出海的动机和成功率（孟寒和严兵，2020）。国家级经开区同样能为区内企业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持。一方面，国家级经开区通过出台各种人才政策吸引人才入驻经开区；另一方面，基于循环累计理论，经开区内的集聚经济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进而吸引人才主动入驻经开区，进一步促进区内人才集聚（Lu et al., 2023）。通过区内人才集聚所形成的劳动力蓄水池，企业能根据自身的出海需求，以较低的搜寻成本，便捷地从劳动力蓄水池中获取所需的专业化劳动力，例如研发人员和具有海外经历的人才等。相较于区外企业，区内企业拥有更大的人才优势，企业出海动机更强。

（三）促进信息共享机制

国家级经开区通过企业集聚效应促进区内企业间信息共享，进而强化企业信息优势，促进企业出海。信息优势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为企业信息要素禀赋、信息获取效率与市场信息差异的识别能力（Dunning and Lundan, 2008）。在出海准备阶段，信息优势能降低企业搜寻最优东道国市场和投资机会的成本，从而提升开拓海外市场的成功率（蒋为等，2019）；在出海经营阶段，信息优势能帮助企业精准地识别东道国客户偏好、供应链成本以及政策动向，提升决策科学性，扩大利润空间并延长存续周期（陆建明等，2020）。然而，后发国家的企业在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上存在的劣势，使得出海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彭羽和郑枫，2022）。国家级经开区能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国家级经开区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优质企业入驻，促

^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EB/OL].https://www.ncsti.gov.cn/zcfg/zcwj/202205/t20220505_76796.html. [2022-04-29].

进了企业在经开区内的空间集聚（林毅夫等，2018）。企业空间集聚缩短了企业间的时空距离，有助于信息和知识在企业间的快速传播（Pindado et al., 2023）。位于国家级经开区的企业能够便捷地从出口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丰富的海外市场、客户和竞争对手等信息，并将学习到的海外信息和出海经验内生，在强化企业出海信息优势的同时，也能降低企业出海的固定成本，进而助力企业出海（Choquette and Meinen, 2015）。

综上，国家级经开区能通过集聚效应帮助区内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人才支持和促进信息共享，强化企业在资金、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的所有权优势，助力企业出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国家级经开区能促进企业出海。

假说 2：国家级经开区通过资金集聚效应缓解区内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形成资金优势，助力企业出海。

假说 3：国家级经开区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为区内企业提供人才支持，促进企业形成人才优势，助力企业出海。

假说 4：国家级经开区通过企业集聚效应强化区内企业信息共享，促进企业形成信息优势，助力企业出海。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为检验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本文采用多期 DID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Foreign_{it} = \alpha_0 + \beta_0 SEZ_{it} + \gamma_0 X_{it} + \mu_i + \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Foreign_{it}$ 为 i 企业 t 年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用于刻画企业出海；核心解释变量 SEZ_{it} 为 i 企业 t 年是否位于国家级经开区内，若是， SEZ_{it} 取值为 1，否则为 0。为了缓解遗漏解释变量偏差， X_{it} 包括了一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此外，本文也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μ_i 和年份固定效应 ϕ_t ，以缓解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遗漏变量问题。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核心解释变量 SEZ_{it} 的估计系数 β_0 ，若 β_0 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国家级经开区促进了区内企业出海。

（二）变量说明

1. 经开区内企业的识别

本文通过识别企业是否位于国家级经开区内来构造外生冲击。国家级经开区由商务部统一管理，园区的设定标准相对统一，优惠政策大体相似（Alder et al., 2016）。同时，国家级经开区的设立时间相对分散，有利于把经开区政策的影响和不可观测的年度固定效应分离开来（卞泽阳等，2021）。因此，本文以国家级经开区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国家级经开区均披露了具体的四至范围，故本文使用地理信息技术识别国家级经开区内的企业。第一，本文手工搜集各国家级经开区的四至范围信息、边界形状图和规划图，运用 ArcMap 精确绘制国家级经开区的边界图层。第二，基于样本企业披露的具体办公地址信息，本文利用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的地理编码接口进行解析，得到所有样本企业的精确经纬度坐标。第三，基于构造的国家级经开区的边界图层和企业的经纬度坐标，逐一识别企业是否位于国家级经开区内。

2. 企业出海的测度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出海（ $Foreign_{it}$ ），用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占该企业所有子公司数量

的比重衡量。该指标量化了企业将组织实体和运营活动延伸至海外的程度，反映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建立运营网络、进行实质性投入的水平，因此能够准确刻画企业出海（陈立敏和王小瑕，2017）。此外，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使用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的自然对数以及企业海外子公司所在国家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出海。

3. 控制变量

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从企业层面选取了企业规模（*Size*）、净利润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占比（*Fixed*）、现金流比率（*Cashflow*）、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和企业年龄（*Firmage*）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蔡庆丰等，2021）。其中，企业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净利润率用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和总资产的比值衡量；固定资产占比用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现金流比率用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营业收入增长率用本年营业收入相对上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衡量；企业年龄用企业从成立年份至今的年数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200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国家级经开区对区内企业出海的影响，数据主要来源如下。一是国家级经开区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商务部网站、自然资源部网站、各国家级经开区官方网站、百度等公开渠道，并通过手工搜集获得。二是上市企业的办公地址信息和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剔除在研究期间被ST、*ST或退市处理的样本；剔除金融类上市企业；剔除样本期内一直位于经开区内的企业；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同时，本文借鉴林毅夫等（2018）、张丽华等（2021）的做法，以国家级经开区内的企业为处理组，以在国家级经开区所在城市内、但在国家级经开区外的企业为对照组。此时，在样本期内，处理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所在城市均有设立国家级经开区，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它们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等相似，它们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差异主要是由入驻国家级经开区所导致的。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Foreign</i>	37,061	0.0445	0.1004	0.0000	0.5200
<i>SEZ</i>	37,061	0.0972	0.2963	0.0000	1.0000
<i>Size</i>	37,061	21.9498	1.2599	19.6910	25.9276
<i>Lev</i>	37,061	0.4284	0.2055	0.0541	0.8945
<i>ROA</i>	37,061	0.0407	0.0636	-0.2238	0.2161
<i>Cashflow</i>	37,061	0.0467	0.0716	-0.1758	0.2481
<i>Fixed</i>	37,061	0.2232	0.1676	0.0021	0.7208
<i>Growth</i>	37,061	0.1771	0.4057	-0.5861	2.4821
<i>Firmage</i>	37,061	2.7584	0.4482	1.3863	3.4965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研究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本文根据方程（1），通过不断纳入控制变量展开实证分析。表2展示了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列（1）为不纳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列（2）为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2列（1）~列（2）发现，*SEZ*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国家级经开区能提高区内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促进区内企业出海。该结论验证了假说 1。

（二）平行趋势假设评估

本文基准回归采用了多期 DID 模型，使用该方法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将企业入驻国家级经开区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国家级经开区对区内企业出海的影响，回归结果如图 2 所示。该结果显示，在入驻国家级经开区之前，处理组企业和控制组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没有显著差异，保证了基准回归使用多期 DID 模型的准确性。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Foreign</i>	
<i>SEZ</i>	0.0131*** (3.1142)	0.0113*** (2.7091)
控制变量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6,679	36,679
R ²	0.7285	0.7347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statistics，所有回归结果聚类到企业层面；下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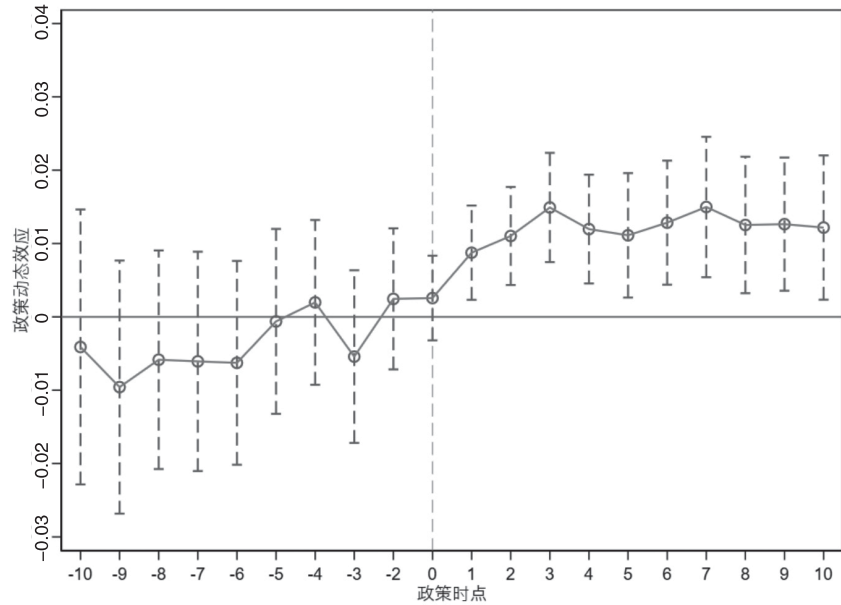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三）安慰剂检验

为了证明估计结果并非由其他随机因素影响，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即通过随机设定企业入驻经开区时间、随机选择样本企业作为经开区企业，构建虚假政策虚拟变量进行回归。本文对上述过程重复 1,000 次，虚假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布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虚假估计系数以零值为中心呈正态分布，真实估计系数（0.0113）也完全独立于模拟估计系数之外，说明本文的结论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即国家级经开区确实促进了企业出海。

（四）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出现负权重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Goodman-Bacon, 2021）。基于 twowayfweights 命令的负权重诊断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估计结果确实存在负权重问题，但负权重的平均处理效应占比较小，约为 0.53%。进一步看，本文基于 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2020）提出的包含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稳健估计方法，运用事件研究法估计动态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在入驻国家级经开区之前，平行

趋势假设仍然成立，说明异质性处理效应下的负权重问题未造成动态平均处理效应有明显的估计偏差。以上结果说明，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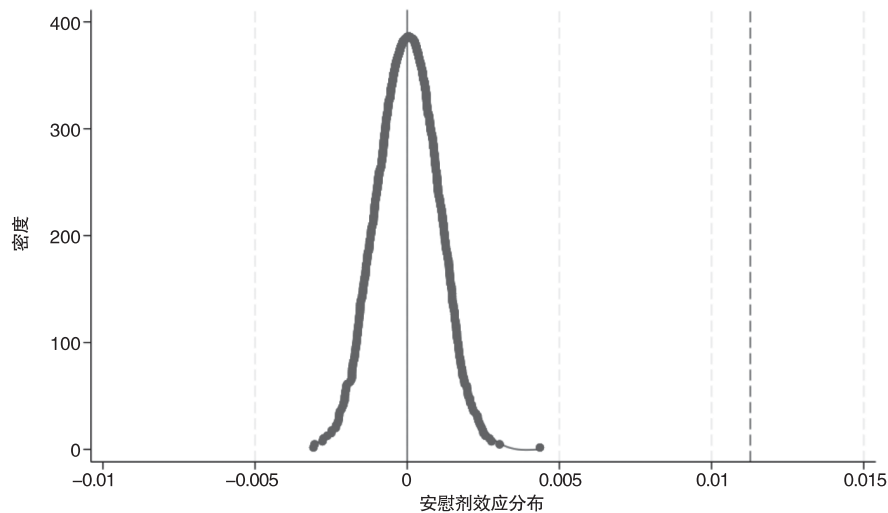


图3 安慰剂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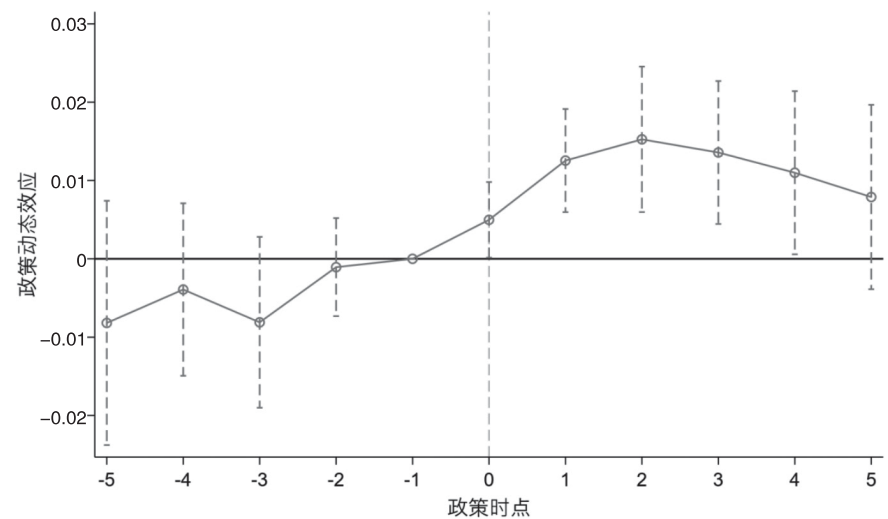


图4 动态平均处理效应结果

（五）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方程（1）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即国家级经开区可能偏好吸收国际化水平更高的上市企业，企业海外子公司较多可能是入驻国家级经开区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本文使用工具变量策略进行缓解。针对方程（1）中企业入驻国家级经开区这一可能的内生变量，本文借鉴 Zheng 等（2017）、张丽华等（2021）的思路，使用企业到城市中心的距离（*Distance*）构建工具变量。一方面，为了降低改革试验的试错成本和实际开发成本，国家级经开区通常设立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和农村地区（鲍克和夏友富，2008；陈艳莹等，2024）。距离城市中心越远的企业，位于国家级经开区内的概率就越高，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根据 OLI 理论，企业设立海外子公司主要受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驱动，企业与城市中心的距离与其是否设立海外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联系，近似满足外生性条件。因此，可以

认为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

本文以市政府所在地代表城市中心，基于企业经纬度和市政府经纬度计算两者间的距离，并对该距离取自然对数，计算得到工具变量 *Distance*。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方程（1）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3 列（1）~ 列（2）所示。同时，本文还进行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表 3 的结果表明，在考虑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国家级经开区仍能促进企业出海，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2. 倾向得分匹配法

我国在设立国家级经开区时，可能存在由非随机性带来的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本文运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内生性检验，缓解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 1:1 近邻匹配方法，并以 0.05 为卡尺范围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在匹配后的样本中进行 DID 回归，结果如表 4 列（1）所示。结果显示，*SEZ*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家级经开区能促进企业出海，本文基准回归的结论依然稳健。

3. Heckman 两阶段法

本文进一步采用 Heckman 二阶段法对样本自选择问题予以控制。本文同样采用企业到城市中心的距离（*Distance*）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第一阶段的 Probit 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列（2）所示。然后，本文根据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其代入第二阶段模型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列（3）所示。可以看出，逆米尔斯比率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此外，第二阶段模型中 *SEZ*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基准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六）其他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现有研究的做法，使用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的自然对数（*Foreign_1*）、企业设立海外子公司的国家数量的自然对数（*Foreign_2*）衡量企业出海行为，替代原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5 列（1）~ 列（2）所示。可以看出，企业入驻国家级经开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和企业海外子公司所在国家数量，说明国家级经开区能促进企业出海，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SEZ</i>	<i>Foreign</i>
<i>Distance</i>	0.3365*** (62.8518)	
<i>SEZ</i>		0.0125*** (2.7865)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6,679	36,679
R ²	0.7220	0.0241
Kleibergen-Paap rk LM	37.515 (0.0000)	
Stock-Yogo	16.38	
Cragg-Donald rk Wald F	625.847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41.402	

注：表中“Kleibergen-Paap rk LM”一行括号内报告的是 LM 统计量的 P 值；括号里的数值为经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后的 t 值。

表 4 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Foreign</i>	<i>SEZ</i>	<i>Foreign</i>
<i>SEZ</i>	0.0113*** (2.7095)		0.0107*** (2.6084)
<i>Distance</i>		0.1333*** (12.4498)	
<i>Imr</i>			-0.0210 (-1.12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观测值	36,653	36,492	36,109
R ²	0.7347	0.0282	0.7374

注：列（2）和列（3）括号里的数值为经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后的 t 值。

2. 增加固定效应和更换聚类层级

考虑到在同一城市和产业内，企业出海可能存在溢出效应，导致随机误差项存在组内相关性。因此，本文将标准误分别聚类到城市和产业层面，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6列（1）~列（2）。另外，本文在方程（1）基础上分别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城市×年份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6列（3）~列（6）。综合表6结果可知，在不同聚类层级和不同固定效应下，*SEZ*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表明国家级经开区能促进企业出海，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5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Foreign_1</i>	<i>Foreign_2</i>
<i>SEZ</i>	0.0642** (2.2358)	0.0475** (1.9840)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6,709	36,751
R ²	0.1681	0.1667

表6 不同固定效应和聚类层级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Foreign</i>					
<i>SEZ</i>	0.0113*** (2.6527)	0.0113*** (3.7342)	0.0123*** (2.8620)	0.0112*** (2.7104)	0.0081** (2.1245)	0.0080** (1.96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聚类	是					
产业聚类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36,679	36,679	36,679	36,679	36,040	36,668
R ²	0.7347	0.7347	0.7436	0.7368	0.7637	0.7431

3. 控制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干扰

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探索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先行区，一直以来承担着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重任（张杰等，2021）。当前，为了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不少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助力科技企业加速出海，提前进行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可能影响本地企业出海，导致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影响。本文构建虚拟变量*GXJS*表征企业是否受到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政策的影响。若*i*企业*t*年所在城市设立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则将*GXJS*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在方程（1）中纳入虚拟变量*GXJS*，回归结果如表7列（1）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影响后，*SEZ*的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4. 采用泊松伪极大然估计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存在零值情况，本文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PML）再次进行回归（Silva and Tenreiro, 2006），回归结果如表7列（2）所示。结果显示，*SEZ*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5. 更换研究样本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没有包含所在城市未设立国家级经开区的企业，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国家级经开区的自选择问题所造成的估计偏误。但是，上述做法也导致我们损失了一部分企业样本。因此，

本文使用上市企业全样本数据根据方程（1）再次进行回归，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 7 列（3）所示。结果显示，*SEZ*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6. 排除宏观因素干扰

考虑到企业出海也可能受到当地宏观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lnPGDP*）和产业结构（*IS*）两个宏观层面的变量。其中，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衡量，产业结构通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进行衡量。本文重新估计方程（1），回归结果如表 7 列（4）所示。可以看出，*SEZ* 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7 其他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Foreign</i>			
	控制国家高新区	PPML 估计	全样本企业	控制宏观因素
<i>SEZ</i>	0.0110*** (2.6591)	0.1845*** (4.3291)	0.0105* (1.7634)	0.0113*** (2.74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6,679	17,662	43,706	36,435
R ²	0.7351	0.1965	0.7191	0.7352

六、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1. 缓解融资约束

在理论分析中，笔者认为国家级经开区的资金集聚效应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强化企业资金优势，促进企业出海。为验证这一假说，本文借鉴蔡庆丰等（2021）的做法，以企业当年新增融资额（*Debet*）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当年新增融资额越大，意味着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低。^①表 8 列（1）展示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当年新增融资额的影响。可以看出，*SEZ* 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家级经开区能缓解区内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资金优势，促进企业出海。假说 2 得到验证。

表 8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Debet</i>	<i>lnRDPerson1</i>	<i>lnRDPerson2</i>	<i>lnSharing1</i>	<i>lnSharing2</i>
<i>SEZ</i>	0.0566** (2.0182)	0.0630** (2.0821)	0.0591** (2.0163)	0.0877** (1.9648)	0.1143** (2.08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6,679	17,756	22,737	36,109	36,109
R ²	0.7521	0.9145	0.9108	0.6000	0.5965

2. 提供人才支持

在理论分析中，笔者认为国家级经开区的人才集聚效应能为企业出海带来更多的人才支持，进

① 企业当年新增融资额=（当年长短期贷款总额-上年长短期贷款总额）/当年总资产。

而强化企业人才优势,促进企业出海。为验证这一假说,本文分别使用企业当年研发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ln RDPerson1$)和企业当年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ln RDPerson2$)作为人才支持的代理变量,检验国家级经开区是否通过区内人才集聚增加了对企业的人才支持,回归结果如表8列(2)~列(3)所示。可以看出, SEZ 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家级经开区能为区内企业带来更多的人才支持,进而强化企业人才优势,促进企业出海。假说3得到验证。

3. 促进信息共享

在理论分析中,笔者认为国家级经开区的企业集聚效应有助于区内企业间信息共享,进而强化企业信息优势,促进企业出海。为验证这一假说,本文借鉴薛军和程红雨(2024)的做法,使用关注企业的证券分析师人数的自然对数($\ln Sharing1$)和对该公司进行分析的研报数量的自然对数($\ln Sharing2$)衡量企业信息共享水平。通常来讲,企业对外信息共享越多,证券分析师更容易获得该公司的信息,跟踪该公司的证券分析师也会越多,对外公布的研报数量也越多。本文检验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信息共享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8列(4)~列(5)所示。可以看出, SEZ 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家级经开区能促进区内企业间的信息共享,进而强化企业信息优势,促进企业出海。假说4得到验证。

(二) 异质性检验

1. 企业行业特征

国家级经开区在设立初期,通常会根据当地的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以及资源禀赋优势设定区内的主导产业(卞泽阳等,2021)。相较于非主导产业,国家级经开区内与主导产业有关的优惠政策往往数量更多、强度更大,导致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主要向区内主导产业集聚(吴敏等,2021)。当区内企业所在行业属于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时,国家级经开区内的资金集聚和人才集聚引致的融资约束缓解和人才支持效应将更加显著,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大。

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整理出各国家级经开区的主导产业,然后将各主导产业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的2位行业代码进行匹配,识别出各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的2位行业代码。然后,本文构建虚拟变量 Ind 衡量企业所在行业是否属于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若区内企业所在行业代码与国家级经开区某主导产业的行业代码相同,将 Ind 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将 SEZ 与 Ind 的交互项纳入方程(1),回归结果如表9列(1)所示。可以看出, $SEZ \times Ind$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区内企业所在行业属于国家级经开区某一主导产业时,国家级经开区对其出海的积极影响更大。这一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猜想,也侧面证实了国家级经开区的资金和人才集聚机制。

2. 企业高管特征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企业核心高管的海外经验也会对企业出海决策产生影响(薛军和程红雨,2024)。具备海外经验的核心高管具有更多海外市场知识,能够更好地识别海外扩张相关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因此众多企业的海外扩张通常由具有国际经验的核心高管所领导(任鸽等,2019)。国家级经开区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优质企业集聚,促进了区内海外经验的传播和共享。此时,具备海外经验高管能帮助企业更好地处理、分析以及深入理解这些海外经验,提高企业获得东道国资源和市场信息的能力,进而增强企业成功出海的概率。因此,当区内企业有具备海外经验的核心高管时,国家级经开区内企业集聚引致的信息共享效应将更加显著,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大。

鉴于此,本文构建虚拟变量 $Oversea$ 表征区内企业核心高管是否具备海外经验,通过企业核心

高管（董事长、CEO）是否有海外经历衡量。若区内企业的核心高管中至少有一位有海外经历，则将 *Oversea*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本文将 *SEZ* 与 *Oversea* 的交互项纳入方程（1），回归结果如表 9 列（2）所示。可以看出，*SEZ* × *Oversea*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区内企业的核心高管有海外经历时，国家级经开区对其出海的积极影响更大。本文进一步从董事长海外经历和 CEO 海外经历分别探讨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9 列（3）和列（4），此时回归结果同样支持上述结论。因此，以上分析验证了本文的猜想，也从侧面证实了国家级经开区的信息共享机制。

表 9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Foreign</i>			
	是否属于主导产业	高管海外经历	董事长海外经历	CEO 海外经历
<i>SEZ</i> × <i>Ind</i>	0.0224* (1.9376)			
<i>SEZ</i> × <i>Oversea</i>		0.0308*** (2.7840)	0.0288** (1.9741)	0.0324* (1.6807)
<i>SEZ</i>	0.0010 (0.1385)	0.0094** (2.2664)	0.0099** (2.4534)	0.0090** (2.2756)
<i>Ind</i>	-0.0133 (-1.4600)			
<i>Oversea</i>		0.0186*** (3.2276)	0.0213*** (3.6407)	0.0188*** (3.388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196	25,606	25,821	36,679
R ²	0.7768	0.7690	0.7713	0.7348

七、结论与启示

当前，我国正掀起一股新的出海浪潮，企业出海是我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国家级经开区这一典型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切入，以我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在精确识别国家级经开区边界以及区内外上市企业的基础上，探究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企业出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经开区显著促进了区内企业出海，且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国家级经开区通过资金、人才和企业集聚，能有效缓解区内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人才支持和促进信息共享，进而强化企业所有权优势，助力企业出海；国家级经开区对所在行业属于经开区主导产业、核心高管具备海外经历的企业出海促进作用更大。

国家级经开区是我国外贸外资的第一梯队，也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在新发展阶段，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如何激发国家级经开区的对外开放“头雁”效应，以国家级经开区建设助力企业出海？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园区营商环境，扩大招商引资资源，推动形成集聚经济。一方面，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区内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行政效能的关键举措，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最大程度地为企业入驻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积极拓宽国家级经开区的对外交流渠道，通过投洽会、进博会等平台，加大对园区各类优惠政策的宣传推广力度，增强经开区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第二，聚焦主导产业，打造“精准化”产业出海生态圈。一方面，深入研究目标海外市场的产业链缺口、技术标准和政策环境，为区内主导产业企业提供精准的国别指南、市场准入分析和风险预警；另一方面，设立支持主导产业企业出海的专

项基金,将资金重点投向具有核心技术、品牌潜力且符合主导产业方向的企业,助力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和建设研发中心。第三,深化人才机制创新,积极构筑国际化人才蓄水池。一方面,国家级经开区可联合当地高校和研究机构,打造国际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企业与人才间国际市场动态、文化差异、管理模式等关键信息的流通与共享;另一方面,在经开区范围内提升涉外政务服务能力,完善国际化的生活配套,营造吸引国际化人才的宜居宜业环境,降低企业获取高端国际化人才的综合成本。

参考文献:

- [1] 鲍克,夏友富.载体型产业空间与中国经济成长——论30年科技工业园区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J].管理世界,2008(7).
- [2] 卞泽阳,李志远,徐铭遥.开发区政策、供应链参与和企业融资约束[J].经济研究,2021(10).
- [3] 卞泽阳,强永昌,李志远.开发区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J].国际贸易问题,2019(11).
- [4] 蔡庆丰,陈熠辉.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并购[J].中国工业经济,2020(6).
- [5] 蔡庆丰,陈熠辉,林海涵.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J].金融研究,2021(5).
- [6] 陈立敏,王小瑕.国际化与绩效提升:基于Meta整合与Meta回归两种方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7(2).
- [7] 陈艳莹,曹天一,张子贞.信息可得性会影响开发区的绿色赋能效应吗——来自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24(11).
- [8] 陈钊,熊瑞祥.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来自出口加工区准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5(8).
- [9] 邓新明,熊会兵,李剑峰,等.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4(1).
- [10] 黄玖立,吴敏,包群.经济特区、契约制度与比较优势[J].管理世界,2013(11).
- [11] 蒋为,李行云,宋易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扩张的新解释——基于路径、社群与邻伴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9(3).
- [12] 李丽霞,李培鑫,张学良.开发区政策与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J].经济学动态,2020(7).
- [13] 李雪松,党琳,赵宸宇.数字化转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22(10).
- [14] 林毅夫,向为,余森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J].经济学(季刊),2018(2).
- [15] 刘莉亚,何彦林,王照飞,等.融资约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5(8).
- [16] 陆建明,姚鹏,卢萌.投资壁垒与海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增长边际[J].国际贸易问题,2020(1).
- [17] 毛捷,柏金春.开发区债务增长的机理研究——基于开发区边界的精准识别[J].管理世界,2024(9).
- [18] 孟寒,严兵.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20(4).
- [19] 彭羽,郑枫.“一带一路”沿线FTA与出口二元边际:基于网络分析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2022(4).
- [20] 任鸽,陈伟宏,钟熙.高管国际经验、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国际化进程[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9).
- [21] 盛丹,张国峰.开发区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布[J].经济学(季刊),2018(1).
- [22] 孙伟,戴桂林.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J].国际贸易问题,2021(1).
- [23] 孙伟增,陈斌开.开发区政策可以促进城市平衡发展吗?[J].经济学(季刊),2023(1).
- [24] 孙伟增,吴建峰,郑思齐.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的消费带动效应——以开发区政策为例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
- [25] 谭静,张建华.开发区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9(1).
- [26] 王永进,张国峰.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J].经济研究,2016(7).
- [27] 吴敏,刘冲,黄玖立.开发区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来自专利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1(5).
- [28] 谢洪明,章俨,刘洋,等.新兴经济体企业连续跨国并购中的价值创造:均胜集团的案例[J].管理世界,2019(5).
- [29] 谢红军,吕雪.负责任的国际投资:ESG与中国OFDI[J].经济研究,2022(3).
- [30] 薛军,程红雨.股东关联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所有权优势提升角度[J].国际贸易问题,2024(5).
- [31] 阎大颖,洪俊杰,任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9(6).
- [32] 杨婵,贺小刚,闫静波.企业国际化决策中的制度效应:入驻开发区的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4).
- [33] 杨忠,张骁.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9(2).

- [34] 张杰, 毕钰, 金岳. 中国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J]. 管理世界, 2021(7).
- [35] 张丽华, 甘甜, 许政. 开发区的环境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企业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21(12).
- [36] 赵晓阳, 衣长军, 陈初昇. 母公司数字化转型能提升海外子公司绩效吗——来自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24(4).
- [37] 郑江淮, 高彦彦, 胡小文.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8(5).
- [38] Alder, S., Shao, L., Zilibotti, F. 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21).
- [39] Choquette, E., Meinen, P. Export Spillovers: Opening the Black Box[J]. The World Economy, 2015, 38(12).
- [40] De Chaisemartin, C., d'Haultfoeulle, X. Two-way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9).
- [41] Dunning, J. H.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J].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88, 3(1).
- [42] Dunning, J. H., Lundan, S. M. 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25).
- [43] 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 [44] Lu, F., Sun, W., Wu, J.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30 Years of Evidence from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3, 15(3).
- [45] Lu, Y., Wang, J., Zhu, L. Place-based Policies, Cre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9, 11(3).
- [46] Neumark, D., Kolko, J. Do Enterprise Zones Create Jobs? Evidence from California's Enterprise Zone Program[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0, 68(1).
- [47] Pindado, E., Sánchez, M., Martínez, M. G.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veness: When Too Little or Too Much Agglomeration Hurts[J]. Research Policy, 2023, 52(1).
- [48] Silva, J. S., Tenreiro, S. The Log of Gra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 88(4).
- [49]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101).
- [50] Zheng, S., Sun, W., Wu, J., et al. The Birth of Edge Cities in China: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Parks Policy[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7(100).

Place-based Policies,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Firms Going Global: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YU Zhen XU Dehu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firms going global has become a strategic choice for shaping a country'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ploring effective pathways for Chinese firms to go global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national-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ETDZs) a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of place-based policies. Based on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TDZ boundaries and firms within these zones, we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national-level ETDZs on Chinese firms going global. The study finds that national-level ETDZs significantly promote firms going global. Specifically, these zones, through their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terms of capital, talent, and firms, effectively allevi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provide talent support, and facilitate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firms. This, in turn, enhances the firms' ownership advantages and promotes their going global. Furthermore,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for the firms in industries dominated by the ETDZ and those whose core executives have overseas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and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further advancing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Keywords: place-based policies; firms going glob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ownership advantages

(责任编辑: 张建华)